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Research

2009年 6期

要 目

- | | |
|------|--|
| 新闻动态 | CCG发布2009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
海归创业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
| 月度论坛 | CCG举办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论坛 |
| 国际问题 | 郭生祥：“中美国”概念的本质 |
| 深化改革 | 王辉耀：中国需要民间智库 |
| 和谐社会 | 薛 澜：完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的建议 |
| 国家形象 | 陶庆华：中国需要符合国民认知的国家形象 |
| 经济转型 | 汤 敏：谁来拉动明年的经济增长
郑永年：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内外压力 |
| 刺激内需 | 黄亚生：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
| 医疗改革 | 孙君泓：中国需加强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建设 |

www.ccg.org.cn

电话：010—64392122、64392123、64398745 传真：010—64398744 邮箱：bianjibu@ccg.org.cn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

2009年6期

主办单位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
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

合作单位

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会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

总编

王辉耀

编委(以姓氏拼音为序)

高志凯 汤敏 陶庆华 田溯宁
王波明 薛澜

执行主编

邓宗南

编辑

苗绿 常慧敏 封涛

编务

王颖 闫萌萌 蒋佩玉 柏彦

特邀专家委员会(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宏 汉能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陈兴动 法国巴黎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
崔大伟 香港科技大学中国跨国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邓峰 北极光创投创始合伙人
邓中翰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克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范文仲 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局副局长
傅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
海闻 北京大学副校长
何宁 商务部美大司司长
胡援东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办事处首代
胡兆庆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
黄靖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黄亚生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靳志伟 欧美同学会秘书长
康绍邦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李山 三山公司合伙人
李百炼 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副校长
李成 美国布鲁金斯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

李稻葵 清华经济管理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李连仲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
李小加 香港证券交易中心总裁
李一 瑞士银行(UBS)中国区主席兼总裁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
李兆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梁能 中欧商学院管理学教授、EMBA主任
林达贤 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常务副会长
林晓华 加拿大Ryerson大学国际研究院院长
刘二飞 美林证券中国区主席
刘宏 英国曼切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吕晓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梅平 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
潘晨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副局长
钱颖一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饶毅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
饶子和 南开大学校长
王永庆 中央统战部六局局长
宋永华 中央组织部人才局副局长
孙建立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管理司司长
孙选中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
谭天星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司长
王俊峰 金杜律师事务所主席,创办人
王小凡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
王晓萍 国务院侨办政策研究司司长
王文生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吴江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
周云帆 中关村管委会副主任
项兵 长江商学院院长
谢国忠 原摩根士丹利亚大区首席经济学家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终身教授
徐小平 新东方教育集团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许唯宁 欧美同学会副秘书长
杨锐 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主持人兼制片人
杨壮 北大国际MBA美方院长
姚树洁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学院院长
易珉 GE公司环渤海区总经理
张健青 国务院侨办经科司副司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张信刚 原香港城市大学校长,美国百人会会员
张亚勤 微软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张忠 美国沃顿商学院终身教授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民 中国银行副行长
朱云来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
左小蕾 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 新闻动态

CCG 发布 2009 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

截至2008年,中国内地出国留学总人数约为139万,归国留学人员达39万。到今年底,估计出国留学人数将超过160万,归国留学人员则接近50万。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与同盟会,到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邓小平与中国共产党;再到当代的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奋斗于科、教、文、卫、经济等各领域的杰出人才,百年海归,人才辈出。同样,海外的中国留学人员群体也人才济济,包括像杨振宁、李政道、崔琦这样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世界级科学家以及活跃在美国硅谷的大批创业人才。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CCG)发布《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时指出:在过去的一百年当中,海归为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在中国日渐与全球接轨以及教育体系培养人才能力滞后的今天,送出优秀青年去先进发达国家与世界顶尖名校深造,保证符合自身需要的高层次留学人才能够回国创新创业,并配套合宜的人才机制、平台、环境,对中国目前的建设与发展至关重要,也是中国在全球化时代重要的社会课题。

2009年11月14日,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就于北京国际饭店发布了《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该报告由机械工业华章出版社出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担任主编,教育部国际司出国留学工作处资深调研员苗丹国,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程希作为特邀专家担任副主编。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陶庆华,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总经理周中华,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留学人员和回国专家处长张剑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兆熙,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王文生,北京市侨联秘书长赵国强,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阿尔斯通中国区总经理王春岩,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事及国际委员会主席高志凯,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葛明,价值中国网首席执行官林永青,中国瑞尔(国际)集团公司总裁邹其芳,北京希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忠义(排名不分先后)等有关嘉宾参加了这次发布会。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一直致力于为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供战略性、可行性、客观性、独立性、建设性的研究与建设。《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主编王辉耀在概括新时期中国留学潮十大趋势称：

一，未来中国的留学潮只会更“热”。中国发展的需要，教育体系改革的滞后，加上更多的人有经济条件自费出国留学。至2000年，中国总共才送出34万留学生，但现在一年就送出20万留学生。

二，留学从体制内扩散到体制外留学为主。上世纪80年代，大部分留学生都是公费留学。随着个人收入的逐渐提高，大多数人留学已不再取决于是否获得国内外的奖学金和资助。如今自费留学已经占全部留学人数的比例超过95%。

三，留学日渐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低龄化。2007年上海出国留学生当中大约27%是15到19岁的低龄青年。留学生的日渐大众化也意味着“海带（待）”等现象未来只会更普遍。

四，留学目的地日渐广泛。过去留学生大多选择发达国家。2008年，在外留学生已分布全球109个国家和地区，“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留学生”。

五，留学专业选择日渐多元化。改革开放之始，大多数人出国留学都选择理工科专业。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型，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经济、法律、工商管理等学科。随着国家对软实力建设的重视，选择人文社会学科的留学生也大幅度增加。

六，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毕业后倾向于继续海外深造。美国一项调查显示，2000年以前，拥有学士学位但仍继续学习的中国人比例约为11.5%，而此后5年这一比例则达到大约44.1%。

七，高端留学人才以及留学生回归比例相比上世纪有所下降。2000年，已经回来的留学生占中国留学生总数大约38%，而2008年则下降到28%。不过，在金融危机以及中央出台“千人计划”加大引才力度等大背景下，高端人才与留学生整体回归比例近期正处在回升。

八，留学生回归后集中在一线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在《人民日报》2007年进行的调查中，只有2%海归在中西部地区就业。沿海地区与大城市有留学生发挥才能所需的“硬件”和“软件”，这一趋势短时间内不会改变。但如从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考虑，可考虑有针对

性引导部分领域、中西部有需求的高层次留学人才去中西部发展。

九,留学生就业日渐多元化,传统海外华人多从事“三刀”(菜刀、剪刀、剃刀),高学历的留学生大量从事“三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技术性工作改变了这一情况,新世纪还有向“三家”(科学家、企业家、发明家)发展的趋势。留学人员回国就业也发生巨大变化,相比过去大部分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近年在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的样本调查中,海归在国有企业工作的比例不到10%,在政府部门仅有3.4%,大多数在三资与私有企业发展。

十,跨国循环流动的留学生日益增多。随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形式的日益灵活以及对外开放的扩大,跨国从事贸易、文化等的“海鸥”群体目前已经超过10万。

王辉耀总结时强调:中国在全球化中正面临着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等重大挑战。中国目前外汇储备和经济总量已非常庞大,缺乏的不是资金与硬件而是高端人才。但是,引进人才不能只靠资金和硬件去吸引,还必须配套相应政策体系,完善有关评估、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的机制以及整体的环境、土壤,才能引进并挽留住、使用好高端人才,国家也才能获得最大的人才贡献。

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总经理周中华也高度评价《中国留学人才发展报告(2009)》称:该报告既全面、完整地记录了新中国出国留学活动60年重大事件,也有个案分析;既有基于社会调查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有对档案资料的发掘梳理;既有具体工作实践的认知积累和理论总结,也有学术研究的批判反思和观点提炼;既有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审视,也有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考察。这是众多关注中国留学与海归问题的学者、专家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智慧结晶,对于研究中国当代留学与海归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海归创业发展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1983年,邓小平发表了“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讲话,这是改革开放后引进海外人才的起点。进入21世纪后,我国提出了“人

才强国”战略，胡锦涛总书记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人才资源，做到自主培养开发人才和引进海外人才并重。”2009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关于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意见》，要求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在未来5到10年内引进2000名高端人才，简称为“千人计划”。

而在“千人计划”出台之前，就已经有一个地方城市出台了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2006年，在无锡尚德企业发展的经验启发下，无锡市政府出台了5年引进30名领军型海外留学归国创业人才计划，简称“530”计划。如今，无锡已成为全国新兴的二线城市的科技领军者，并准备进一步加大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步伐，于2009年12月举办中国海归创业发展论坛。

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无锡）论坛（北京）新闻发布会暨海归回国创业发展与无锡模式座谈会就于2009年11月14日在北京国际饭店召开。会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无锡市政府秘书长吴峰枫，无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局局长戴锡生，无锡市人事局副局长胡逸，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谢永杰，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处长戴威，无锡市人才服务中心部长吴腾骝以及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陶庆华，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留学人员和回国专家处长张剑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李兆熙，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王文生，北京市侨联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秘书长赵国强，法国巴黎证券（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陈兴动，新东方文化研究院院长徐小平，阿尔斯通中国区总经理王春岩，北京股权投资基金协会常务理事及国际委员会主席高志凯，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葛明，价值中国网首席执行官林永青，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总经理周中华，中国瑞尔（国际）集团公司总裁邹其芳，北京希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忠义（排名不分先后）等出席了会议。

《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光明日报》、《新京报》、《中国政协报》、《中国人事报》、《21世纪经济报道》、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等全国30多家媒体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会，并就政府对海归企业的支持和帮助、海归创业选择与互联网行业发展的联系和关系、海归创业发展论坛以及无锡市吸引人才推动产业发展的经验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采

访。《人民日报海外版》、《参考消息》、《21世纪经济报道》会后还进行了专访。

无锡市政府秘书长吴峰枫介绍了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无锡)论坛的有关情况。他指出:当前无锡面临着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按照中央“千人计划”的要求,以更加有力的措施引进海外高新技术、高级管理、高级创意人才。十二月举办的“中国海归创业发展(无锡)论坛”就是以“海归创业与经济转型”为主题,邀请国家有关部委领导、中国海归创业权威专家、国家“千人计划”入选者代表、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代表作深入探讨和交流。无锡也在论坛上举行“美国硅谷(无锡)创新创业中心”揭牌仪式和无锡市2009年第二批次“530”计划项目签约仪式。

无锡市人事局局长戴锡生在介绍无锡贯彻落实中央千人计划的各项最新举措时表示:根据中央“千人计划”的要求和精神,无锡做了自己的“千人计划”,无锡有四个方面的成功经验:一是以“530”计划为基础,还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海归创业的政策体系,形成了整套比较完整的政策和服务体系;二是以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发展新兴产业为重点,进一步明确人才引进的目标;三是以市场为导向,进一步把科技、人才与市场紧密结合起来;四是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进一步强化对海归创业的各种服务,包括公共服务和各种创业服务,进一步加大对海归创业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平台的建设,同时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考核。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致辞中指出:海归是中国市场经济大潮里涌现出来最有活力、最有发展前景的新兴创新力量,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已经成为一种大趋势,也成为中国未来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无锡经验”之所以值得赞赏,就在于引进人才同时还与自身需求、政策支持、提供平台、服务配套结合起来。引进高端人才,只有与人才选拔、使用、评估、激励、挽留结合起来,方便人才发挥才能,也方便国家获得贡献,才能共赢长赢。

新闻发布会后还举行了海归回国创业发展与无锡模式座谈会,“530”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国内海归创业的专家学者以“无锡模式”为典型案例,对海归创业的促进作用,并且从载体建设、人才团队集聚、品牌推广、服务体系完善、产业发展、政府公共服务、如何引进人才推动创新创业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 月度论坛

CCG 举办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论坛

围绕气候变化而开展的讨论和谈判,已经成为全球各国政治家和企业家之间交流磋商的主要内容之一。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APEC、G8峰会,再到哥本哈根,各国都就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正进行着激烈讨论和艰难谈判。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排放大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也备受瞩目。而在面临巨大碳减排的国际压力以及欧美酝酿碳关税等大背景下,如何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企业经营战略和日常管理,进而保持和提高国际竞争力,也是中国政府以及企业的重大挑战。

为此,欧美同学会建言献策委员会、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以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2009年11月19日于欧美同学会会所联合举办了“中国商界应对气候变化圆桌论坛”。论坛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与北京大学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主任吕植共同主持。出席的领导与嘉宾还包括: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侨联副主席陶庆华,国家发改委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副处长李丽艳,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主任张建平,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徐晋涛,绿创环保集团董事长姜鹏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全国高科技担保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张信良,阿尔斯通能源管理中国区总经理王春岩,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董事长葛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孙姗,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气候变化项目主任何毅,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杜涓,自然景象环境保护协会项目主管李楠,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卢思聘(排名不分先后)等。新华社、《南方周末》、《中国日报》、《中国企业家》、搜狐等媒体也参加了此次论坛。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发言指出:作为发展中大国和排放大国,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扮演具有独特而重要的角色。从全球范围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在采取积极行动应对气候问题,中国企业界也需要对气候变化问题具备清晰、完整的认识,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策划和行动能力。如今中国在全球产业结构中以制造业

为主，如何寻找新技术与可替代性的绿色能源，如何在发展低碳经济与保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寻找平衡，对于中国以及中国的企业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

在论坛中，有关专家、学者也纷纷对中国商界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展开深入讨论。此次论坛在12月“中国商界与环境组织民间代表团”赴哥本哈根参与气候变化大会前夕举办，以便初步形成第一份“中国商界代表团应对气候变化立场”的文件，于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发布，以向国际社会表达中国商界的立场与诉求，并呼吁中国政府在兼顾发展权的基础上制定更积极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 国际问题

“中美国”概念的本质

澳大利亚 IPIE BANK 研究所名誉主任 郭生祥

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弗格森 (Niall Ferguson)，是英文字 Chimerica 的发明人。弗格森说“早在2007年初，似乎中国和美国相互缠绕到变成一个经济整体，我把它称为 Chimerica。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费；中国人出口，美国人进口；中国人放债，美国人借贷。有个时期，Chimerica 不像怪物，而是在天堂结婚。”但在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弗格森则开始单方面责备中国。另外，最先提出G2概念的则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特登 (C. Fred Bergsten)，他认为若要鼓励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承担更多责任，就应和中国分享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他主张，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升级为领导世界经济秩序的两国集团格局。不过，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东亚研究室主任容安澜分析说：“世界上许多问题不能在缺少中美合作的情况下适当地提出或解决，但G2如果像美中能作主、直接解决问题，我不认为中国或美国能够接受这个概念，谈论这概念的是其他那些担心美中会团结起来、告诉他们怎么做的人。”

在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曾向苏联一边倒，后来则与美苏两霸都保

持一定的距离，即为“第三世界”国家。但改革开放开始，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开始向美国倾斜。许多方面，尤其在中国城市，中国与美国不但利益捆绑在一起，而且也越来越相似。联合国最近发布一份关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贫富差距的报告，结果第一名是香港，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是中国，第四是美国。有人评论道，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城市，在全球国家中，并不构成典型意义，真正令人注意的是中国和美国，这也印证了“中美国”概念界定的正确性。于是，一个很好的“中美国”概念出现了，就是中国十几亿相对贫困的人口加上美国同样相对贫困的人口3000万，是地地道道那个还没有发展起来的中国。而美国据说中产以上大约有3亿，加上中国的富裕阶层，他们的生活、生产、生态方式则是地地道道的美国。

其实，只要比较华尔街和秀水街，就可以知道两国的相似与“捆绑”的关联性，秀水街的商品基本上是工业产品，基本也是靠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本三要素换得廉价的出口竞争力。在这里，知识、信息、信用几乎没有用，但这恰好成全了远在大洋另一边华尔街信用经济的膨胀和价格上涨，以及成全了人们更愿意为美国的知识、信息以及创新产品买单。所以，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秀水街与华尔街越来越不可分，那些号称对品牌最亲耐的西方达官贵人在2008年奥运也不惜屈尊到秀水街逛一逛。当然，也有两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中国上层不主张美式的政治模式，一个是中国下层广大农村许多方面并没有受美国以及全球化影响，是跟过去一样的“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相对贫困的人口比例是大多数，而美国相对贫困的人口则只是小部分。或者说，美国尽管富裕与贫穷阶层差距很大，但中产阶级占大部分人口意味着已经实现了相对的“共同富裕”。这或许还说明了，中国的贫穷永远只是中国的，美国华尔街背后的繁华也只属于华盛顿、五角大楼以及硅谷。

秀水街把中国农村商品价格压得低低的，秀水街的背后则是农村的资本被政策关在笼子里，比如土地只有承包权，没有买卖权甚至抵押权。工农业与低端制造业产品剪刀差所累积的资本以及利润都投向了城市化。农村商品与其他产业的商品价格低，而城市化的资本包括土地与房价则抬得很高，于是控制城市化资源的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以及房地产企业先富起来了，或者说他们掌握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大部分成果。中国广大农村不但依然贫穷，甚至连基本保障生存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都没有，即使有也跟城市居民实

施不同标准——中国城乡之间的基尼系数已扩大到全世界最前列。

这也反映了为什么中国人与美国人对待富人的态度完全不同，一要归结于相对贫困人数所占比例大小；二要归结于致富的方式。掌握城市化资源对中国人致富影响最大，公务员考试因而成为“国考”，那是最热门的职业。对美国人致富影响最大是知识、信息、才能，政府官员们绝大多数只是中产阶级阶层，所以，人们更愿意创新创业。2004年一项对全球44个国家的民调，问到个人成功主要靠自我奋斗还是外部条件时，美国在44个国家里排名第一，65%的美国人认为要靠自我奋斗。所以，“智慧致富”的方式也让美国人并不“反富”（这里所指的智慧，既是硅谷的才智，也是华尔街的财智，更是华盛顿开发先进机制与政策的才能）。

所以，中国以及中国人应该正确看待“中美国”这一概念，并且意识到自身的问题，尽快加以调整自身经济增长模式，并采取积极有效的社会改革。

◆ 深化改革

中国需要民间智库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王辉耀

今年以来，由中国前副总理曾培炎“出山”组建国际经济合作学会，随后主办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包括李克强副总理在内的政府高层亲自与会，让“智库”开始成为中国新的热门词汇，也向中国知识界以及全球各界传递了一个信号：中国政府日渐重视智库这种非营利的智囊机构，并决心推动其发展。我也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球智库峰会，并与前来的世界著名智库代表包括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协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进行过交流，并有很深的感触。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物质层面的进步举世瞩目：中国举办了史上规模最大的奥运会，是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以至于世界某些媒体把G20峰会称为美中之间G2。然而，这些成就仅仅属于硬件方面，中国的未来以及可持续发展还应包括软实力建设。其中，能否有大量高质量的智库推动政

府决策科学化与合理化，致力社会公共政策完善，是重要内容。

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国情，有着引以为豪西方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然而，正因为能“集中力量”，如果决策不够科学，所带来的损失也会更为巨大。再加上中国“兼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同于西方全职议员，优点是能直接代表各行各业的声​​音，缺点是不可能进行日常的、专业的政策研究，甚至很多都不具备政策分析的专业素质。因此，其实，中国比西方国家目前更加需要政府部门外能提出一定“储备性政策”、并具备专业能力的政策研究机构——智库。

另外，在“国”与“民”之间也并不是绝对化的“共赢”、“共进”的关系，某些情况下难以避免会存在着利益博弈。大多数情况下同样没有时间与专业素养进行专业政策研究的社会机构与公民，又该委托谁来进行相关的公共政策研究？难道政府部门以及国有事业单位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我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特别需要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非官方机构——民间智库，来为公民社会、和谐社会的发展带来实质推动。

但是，中国目前95%的“智库”都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智库。并不是官方智库不好，但就像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竞争导致某些问题一样，中国需要多元、多类型的智库展开公平竞争，尤其是社会公共政策更应该让体制外的社会政策研究机构参与竞争，政府“择优用之”，这样才能更“利民利国”。而不是如目前一样，无论官办智库是否有社会民意认可的研究成果，研究成果是否具备具备社会公信力与影响力，政府都必须给项目与付工资。

同时，目前民间智库发展的社会环境也并不乐观。例如民间智库本是非盈利组织，但现阶段的政策要求却必须让其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或找政府机构挂靠。另外，中国社会公益文化也存在问题。中国企业和个人为社会做慈善，不一定捐图书馆、基础设施，也可以捐助智库帮助完善社会公共政策，有时候完善整个教育体系比建一所希望小学能帮助更多的孩子以及产生更深远的意义。在国外，我们可以看到著名企业家、政要捐助成立了许多智库，例如美国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胡佛研究所、卡特中心、尼克松和平与自由中心等，再如2009年经济学也是历史首位女性诺奖得主奥斯特罗姆辈获奖后就是把奖金捐给了政策研究项目。但在中国，目前看不到类似捐赠，更多是媒体关注什么捐赠就集中什么。而资金来源无法多元化，有可能导致智库被赞助者“利益捆绑”进而失去独立性。当然，光靠捐赠

远远不够。民间智库的发展空间，还取决于社会机构与公民参政议政的空间，以及政府能否形成科学合理的社会采纳机制。

在智库发达的美国，有人将智库称为同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第四大机构，可见其对政府决策、社会公共政策的巨大意义。中国的智库到现在为止远远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要有真正的“大国智库”，中国就需改善官方智库的效率，容许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同时剥去大多数官办智库的行政级别，将身份从官员还原为学者，将不管是否出成果及得到民意认可都付工资的模式改为通过项目付费。同时，在政策上切实鼓励民间智库的发展，并让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在大多数非机密领域尤其社会公共政策等领域展开公平的竞争。从根本上说，中国不仅仅要重视、集结智慧之士，还须形成有利于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文化，中国才可能有“大国智库”。

◆ 和谐社会

完善社会公共政策体系的建议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薛澜

这些年，我们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努力加强学科建设，吸引海内外优秀学者参加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并主持或参与了很多中国公共政策的研究或咨询项目。在工作期间，我广泛接触了中国各级政府决策部门，亲身感受到中国公共政策体系和机制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应该说，中国政府变革的步伐在不断加快，传统的行政手段和计划手段正逐步破除，公共政策过程变得更加开放、更加民主，但同时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

在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每天都有大量公共政策出台，而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关系到公众的现实利益，更会影响到国家的长远利益。所以，公共政策越来越引起社会各方面关注，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利益诉求方，希望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在这一过程中，由于还没有完全形成一套科学、民主的公共政策社会采纳的体系和机制，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还没有充分体现，也很难保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声音都能

充分表达并通过有效的渠道传递到决策者,一些弱势或远离政策渠道的群体利益往往容易被忽略和受侵犯,一些客观公正但与社会情绪不同的理性分析往往被淹没。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下,如何对我们的公共政策体系和决策机制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就更加显得重要。

首先,我们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体系应该调整完善。从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是从全能政府转变成为有限政府。但我感觉另外需要重视的是:如何从“行动”政府转变到“思考”政府。现在虽然政府的政策职能需求非常强,但还缺乏相应的机制与之配套。许多政府部门习惯于冲在前面推动各方面的工作,许多官员整天都非常忙,充分体现了“行动”政府的特点。但是,随着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社会管理机制健全,某些情况下已经不需要政府凡事都冲在前面,更多需要政府去“思考”,在制定政策协调利益方面动脑筋下功夫,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其次,政府外部的政策研究体系,尤其需要重视各种形式的思想库(包括独立的、或在大学存在的政策研究机构)的作用。这些思想库可以运用它们在相关领域的研究积累以及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对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提出独立客观的分析及判断。在一个公开公正的环境下,不同思想库可以对同样的政策问题发表不同的看法,形成一个政策思想的“市场。”通过各种形式的讨论和竞争,不同的声音和方案得到充分的关注,利益相关方充分表达意见,一些比较差的想法得到淘汰,一些有独到见解的政策意见保留下来,形成优胜劣汰的机制。同时,政府内外的政策研究机构可以通过各种形式建立互动关系,使得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具有更加广泛的视野,政府外部思想库的政策目标更加明确。最后,决策者对经过“政策思想市场”筛选过的政策方案做出高质量的抉择,从而使政府决策以及社会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化。

当然,重大决策如何落实以及落实后的评估体系也很重要,评价一项公共政策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影响,需要建立一套可行的评价体系。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要保证社会公众的参与,从而使得这些决策不是简单地对上级领导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如果决策失误并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决策者要为结果负责任,并要承担相应的惩罚。这些工作也许不是1年、5年或10年能够完成的,但我们必须有种紧迫的意识,马上就去做。

◆ 国家形象

中国需要符合国民认知的国家形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侨联副主席 陶庆华

近期,在全球投放的“中国制造”广告引发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有关国家形象的话题也一再被提起。国家形象的意义,对内在于凝聚人心,使国民能为国家感到自豪和神圣,信奉这个国家的梦想、目标,并愿意为之共同奋斗;对外在于减少国家发展的外部阻力,对全球的人才产生吸引力,使他们愿意为归化这个国家而贡献力量。这也是包括中国实施“千人计划”以及公共外交所需要注意的问题,海外对中国的认识基本是“雾里观花”,没有直接与深入的观察与体会,他们的中国印象相当程度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形象。

另外,一个强大国家的形象,不应只有经济、科技以及军事方面的表现,还需以软性的思想、文化、精神、观念作为载体。美国的崛起,伴随着的是美式价值观、美式民主以及美式文化、生活方式席卷世界。同样,在日本、韩国崛起为新兴发达国家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文化、思想、观念的大量“出口”,在中国一浪高过一浪的“韩流”、“日潮”正是体现。在中国过去的汉唐盛世,也不只是硬实力强大,文化、思想的影响力甚至远远超过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的影响力。中国辐射着日本、韩国、越南、泰国等周边国家形成了“汉文化圈”,一个多世纪前,韩国还在以汉语为官方语言;至今,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还被称为唐人街……。也由于这种精神、文化、思想的感染力、凝聚力、影响力,即使屡经朝代更替,中国总能分久必合;尽管“异族”入侵,却最终被同化为“中华民族”一部分,而不似印度一般失去自己的民族语言。

还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内涵,国家形象还必然建立在真实国情基础之上,最终符合国民与世界认知。当社会财富严重两极分化,公民正当权益屡屡受到侵犯,生活在城市、农村底层的大多数弱势群体缺乏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并且没有解决问题的未来指向,即使如何传播公平、法治、完善的国家形象,也必然不为大多数国民所认可。而国家形象一旦不为世界以及国人认可,甚至感到不安,就会成为国

家发展的阻力。这也是塑造国家形象需要注意的地方：不能局限于物质建设，也不只是文化、思想建设和国家感染力、传播力的问题，还必须从根本上体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原则，才能得到最大多数国民的认可。也只有蕴涵世界各地人们所共同认可的一些道德、文化内涵，那么，尽管许多国家的政府主观上宣扬“中国威胁论”，其人民也不会认同这是种“威胁”。

从古到今，中国有许多延续千年的国家梦想：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精神；夜不闭户、尊师重道的文教观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人权意识以及能“外御强敌，内混一统”的国家意识。许多梦想也至今未能实现，例如“病有所治，居有其屋，老有所养”以及“安得广厦千万间”所渴望的住房以及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基本福利与保障。因此，中国目前许多只从经济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观念需要改变，例如即使不能刺激内需，社会保障体系也应该完善，并体现全体国民公平、正义的原则，而不是变成“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企业单位、农村”四个等级；即使没有市场经济的需要，户籍也应该打破城乡背后的福利差距与国民待遇歧视。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形成凝聚大多数国民内心与梦想的国家形象。

最后，国家形象不仅仅还要能象征这个国家的过去，概括了现在，更要能指出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指向“未来能够实现的国家梦想”。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国家形象的作用，使之成为一种总结过去文明传统、指向未来梦想的精神力量，甚至比法治机制与精神更重要，因为即使法制不够健全、完善，国家不够强盛，人们也为了自己能够共赢的、可以实现的“国家梦想”，而愿意遵循社会道德与正义的规则继续奋斗。否则，即使建设成了法治社会，人们尽管会遵循法律，但还是会为了成功而努力钻以及利用法律的空子，甚至不顾基本的道德与正义底线；即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国家也可能因为人心涣散，而无法凝聚、整合大多数的力量导致“富而不强”。

从这个意义说，今天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思想、精神内涵，能够概括中国过去与当下，指向可以实现的国富民强未来的国家梦想，能够凝聚大多数国人的认知与力量，朝一个方向奋斗，并且全球化时代在海外得到认可与羡慕的国家形象，中国才能实现真正崛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

◆ 经济转型

谁来拉动明年的经济增长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 汤敏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中国经济已走上复苏的道路。上万亿财政、近十万亿的新增贷款的投入，保八已成定局，现在该是考虑明年经济发展态势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明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不加大财政及货币投入的条件下，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毋庸置疑，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基础设施建设、大型企业、房地产投资的拉动。然而，当前不论是财政支出还是贷款增量都已打破了历史记录，明年很难进一步扩大规模。所以最近亚洲开发银行、摩根斯坦利等才会预测，明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放缓。那么，谁来拉动中国明年的经济增长呢？

首先，在不能增加财政与货币投入的条件下，就要从提高投资效率下手。很多研究表明，同样的财政与贷款的投入量，如能将其中一部分转投到中小企业中去，效率会更高，增长会更快。特别是当经济已经开始回暖，民间投资的信心增强的情况下，加大对这些领域政策的推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资金从哪里来？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能减，对国有大企业的投入向下调整的幅度不会很大，但是，房地产贷款比例目前已占了银行全部贷款的三分之一，成为房价增长过快的推手，并导致了社会舆情的怨愤。政府可以考虑引导银行释放其中一部分资金转投到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中去，如果财政再加一把火，在税收减缓、贴息、投资引导基金等领域加大投入，借创业板的东风，民间投资、中小企业会引领明年经济增长的风骚。

事实上，过去三十年宏观调控过程的经验显示，在调控初期，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往往是被紧缩的对象。当然，市场前景不好，这些企业本身也在自我收缩。不过，要考虑的是，中国当前大部分就业岗位以及新增就业机会都是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提供，就业与收入则又决定了内需经济能否启动。因此，加大民间投资，促进中小企业更快发展，对解决就业、扩大内需、改善增长结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明年经济来说，扩大内需，减少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是中国目前

面临的重要挑战。毋庸置疑，危机后较长时间里，发达国家的需求会相当疲软。要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把国内最终需求调动起来。老百姓有钱了，消费多了，民生有所改善了，内需经济才能启动。

如何才能让老百姓多消费呢？只有当他们的收入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才能够真正有消费的最终需求。而增加老百姓的收入，解决过剩劳动力包括大学生的就业，不可能靠政府命令企业去加薪，去招聘员工，只有占吸收绝大多数新增就业需求的中小企业真正快速发展起来，进而老百姓才可能有真正的就业机会，劳动收入才能真正有所增长；只有当许多企业开始升级换代，腾笼换鸟，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大学生才不会出现就业难。因此，在大型国有企业已经全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已为今年经济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现行巨额投入无法长期持续的前提下，要保持明年的快速增长，扩大内需，调整结构、促进民生，就都需要把占企业数99%以上的中小企业投资与发展的积极性给调动起来，这是保持明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新的可牵动的龙头。

在这样背景下，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29条措施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其中很多条款对于中小企业发展来说，含金量很高。然而，要使这个文件达到理想的效果，关键在于细节，在于落实。几年前，人大也通过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后来效果并没有原先估计这么显著。对很多部门以及相当部分地方政府来说，中小企业特别是小企业在他们工作服务对象的排序中是比较后置的，落到实处时就没有多少实惠。这就特别需要政府来推动，特别是中央政府来推动。

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内外压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在今年G20召开前夕，美国曾提出一个《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根据美国的说法，这个构架意在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如果这个构架得以实现，那么意味着美国要增加储蓄并减少预算赤字，中国要减

低对出口的依赖，欧洲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企业投资。尽管这项提议并没有成为G20峰会的主要议程，但还是反应到了会议的文件中。很显然，这个“构架”的本质是变相地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实际上，美国也早就连续出台针对中国的所谓的“反倾销”案，包括轮胎和钢板等商品在内。欧盟尽管表面强调自由贸易，但也跟着美国针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思路。

可以预见，只要欧美经济不能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复苏过来，贸易保护主义就只会变本加厉。同时，中国内部在生产性投资与社会投资、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间的结构关系也还需调整。可以说，中国面临着内外的经济压力。

调整出口导向经济的机会正在流失

尽管金融危机源自美国金融监管问题，但不可否认，全球范围内经济结构的确存在着问题。就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来说，从前那种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人储蓄、美国人花钱的模式就很难持续下去。如果意识到这种模式不可持续，就不得不对这个结构进行调整。对中国来说，在这个过程中，反对欧美的贸易保护主义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

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出口导向经济模式在推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增长过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不能说中国不重视内需经济，但中国的确过分依赖于出口经济。自由贸易需要良好的国际条件，如自由贸易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各国领袖们认同和推动全球化，全球经济均衡发展等等。这些条件一旦不存在，出口经济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而这样的危机往往是超出各国本身所能控制的。

这次金融危机本来是调整中国出口导向经济结构的机会。可惜的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有关方面强调的还是出口经济，希望通过各种政策性举措来刺激出口，但这种成功正刺激着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性或者政策性反弹，即贸易保护主义。就国内来说，这种出口补贴实际上造成了穷国（中国）补贴富国（美国）、穷地区（例如农村）补贴富裕地区（如城市）的局面。简单地说，就是政府用从其他经济领域的收入来补贴出口部门。

中国内部的经济结构失衡

除了内需与外贸之间的结构性不平衡外，中国还存在其他方面的结构失衡。首先是国有单位与非国有经济之间存在着不均衡。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出台了数万亿的拯救方案，但大部分的钱流向国有企业，这可能

导致资金的注入不但没有导向产业升级,还可能得到的是产业的无限度扩张与市场的垄断。尽管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但在市场上活动的主角尤其大型企业还主要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容易不按照市场逻辑,甚至可能把金融危机视为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追求本身的利益,例如凭借庞大的、可能因为经济危机而得到加强的资金优势与非国有企业竞争,形成更大程度的垄断,也就造成人们所说的“国进民退”。而与之相关的是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的不平衡。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发展、改善收入分配差异与解决就业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如果生存的制度空间得不到保障,政府的政策以及“救市”投资都倾斜到了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就会生存更加困难,社会启动内需、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也会受到遏制。

最重要的还是生产性投资和社会性投资之间的严重失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大多是生产性投资,社会投资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并且每况愈下,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保等方面的社会投资严重不足。这是市场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基础设施。很简单,没有这个设施,就不能保障最基本的社会正义。因此,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转型最主要的指标就看能否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基础设施。

在这方面,中国遇到了阻力。很多人总以为这些方面的投资是为了救济穷人。思想上没有正确的认识,就很难见诸于行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等社会改革,已经在中国的议事日程上已经有很多年,但进展不大。社会投资需要钱,但钱不是中国的问题。这些年来,中国积累了足够的钱,外汇储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但问题是各级官员不想把钱用到看不见的社会民生投资。没有社会的转型,也就没有经济发展的稳定,社会的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新资源。

结语

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外在的压力不可避免,也会越来越大。全球经济失衡是事实,中国是世界经济体的一部分,不可能不受到失衡的影响。但要有有效回应全球经济失衡所产生的外在压力,中国就必须下大力气进行内部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内部的经济结构均衡化,既不能抵御外在压力的冲击,更不能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刺激内需

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黄亚生

很多人以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为由,来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及老百姓的内需消费不足。从概念和数据上来讲,其实这种理论都站不住脚。任何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保障都不很健全完善,但许多国家仍然在消费。印度的经济增长便是大部分靠消费——虽然印度人的储蓄率比中国人还要高,但印度的消费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比中国大得多。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日本都被认为社保体系不健全,甚至现在美国的社保体系也经常受人诟病,至少不如北欧国家那么好,他们国民为什么依然愿意消费呢?中国内部消费不足的根本症结不在社保体系不健全上,而是因为居民收入太低,增长太慢。居民支出多少完全是由收入所决定,他们储蓄不全是防范未来,而是由于现在没有更多的收入用于支出。

只是因为大多数中国居民的收入低到应付医疗、教育、养老、住房等最基本社会生存成为问题,占据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社保体系甚至可以忽略,所以,人们才会误解为社保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导致了中国内部消费不足。事实上,健全完善的社保体系,也只能是保障每个国民最基本的社会生存需要。因此,即使中国大多数国民都享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内需还是不会有根本性的大启动,因为他们有基本生存、医疗、养老、教育保障后,还是要储蓄整个家庭几十年收入用于住房等一次性消费,或者说还是没有更多的收入来进行大量消费。

目前,中国在社会保障领域已经采取了很多改善措施,这可以提高人民的福祉。社会保障支出如果实施得当,也确实能够降低民众为防范未然而进行储蓄的想法。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中国国民财富的增长严重失衡的问题。

1989—2002年,中国家庭收入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的平均增速为6.3%,目前这一增速回升到9%。而同期中国的平均GDP增长一直稳定10%以上,这说明增加的收入多数进入了政府和企业的口袋,而不是普通居民。在印

度经济中，每增长100块钱，有70至90块钱都转化为居民收入，而中国每增长100块钱，只有40至50元转化为居民收入。自然，就不能冀望国民在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快速增加支出。所以，中国目前刺激消费的政策理论和现实是相反的，“家电下乡”等政策是要让农民消费，但他们却没有更多的钱可以使用。即使在一方面增加了消费，必会导致其在另一方面减少支出，而有钱的富人们却不可能因为这类政策而影响消费习惯。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也无法反映居民消费的真实情况。使用中国数据时一定要弄清楚定义是什么，这个定义的关键点就在于“社会”。“社会”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老百姓，一部分是政府机构和企业。通过把过去30年中国政府公布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数据收集起来，以及研究中国国家统计局每年居民收支调查，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到90年代中后期，如果政府公布的零售额是100元的话，只能在居民收支调查中找到60至70元，也就是剩下的都是政府机构与企业消费。或者说，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情况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也能保持，但可能都是机构消费所贡献。

即使是居民收支调查，覆盖对象也主要是城镇中的工作人员，那些没有工作的人以及农民很少被覆盖进去，所以，那些看上去还不错的数据背后的真实情况可能没有那么乐观。同时，中国人的储蓄大多都用在了一次性消费上，比如城市居民的婚丧嫁娶、购置房产，农村居民的医疗教育。这种一次性消费并不是持续拉动经济真正动力，真正稳定持续的消费是美国人那样平稳地将钱花在日常生活中，这种一次性消费只能恰恰增加居民的储蓄倾向。

要刺激消费的关键不是让政府和企业多花钱，或者鼓励国民花钱，而是要平衡国民财富增长的分配。尤其增加居民里的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因为他们的消费倾向比政府、企业以及富人都要高。另外，产业发展也要注意服务业，企业发展注意中小私有企业，这是吸引低收入人群就业以及提高他们收入的主要途径。很多人认为服务业主要就是IT、金融等，其实不然，印度服务业产出占GDP比例比较高，但它服务业主要形态是个体工商户。但在中国，这个群体的数量在2001年达到高峰后随即下降，最近才开始又有回升。

中国要真正转向消费型经济，还需要认真地重新考虑目前专注于巨额投资和出口的观念，而如何提高民众收入，将是一个非常困难却又必须去完成的重大任务。

◆ 医疗改革

中国需加强初级卫生保健体系建设

澳华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会长 孙君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卫生系统的发展却相对滞后,“看病难,看病贵”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中国卫生总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较低,而个人现金自费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却相当高,这也不难理解“因病致贫”现象的根源,以及人民群众高储蓄以防不测的行为基础。我个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从国家层面就要调整医药体系结构,增加对卫生系统的监管与投入;从卫生系统层面结构调整则要从“以医院为中心”向重视初级卫生保健的转变。由政府主导,以公共产品为全民提供,与医疗保障挂钩,实现成本效益最大化。

传统的观念是生了病看医生,现有医疗卫生体制也以医院为中心。《2008年世界卫生报告初级卫生保健—过去重要,现在更重要》指出:“资源配置集中于高额的治疗服务费用,却忽略了初级预防及健康教育可能减少高达70%的疾病负担。”近年来,鉴于认识到强大的初级保健卫生系统更有效,许多发达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在加强以病人为中心的初级卫生保健改革和投资,提供综合性卫生服务,包括倡导健康、预防疾病、及早诊断、合理治疗、促进康复为一体的服务。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如智利的初级卫生保健,巴西的家庭保健计划和泰国的全民健康保险计划卫生方案都使专科医院和初级保健达到了更好的平衡。为此,建议:

建立全民普及、以人为本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中心

整合公共卫生和各种医疗资源,建立社区(农村可以村为单位)的卫生保健服务中心,覆盖服务区所有个人和家庭,建立个人(家庭)卫生档案,固定提供服务的专业人士,形成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配合的新型医患关系。强调病人/服务对象的生理、心理、社会需求,即整体需求,鼓励病人积极参与治疗,鼓励社区参与初级保健服务中心的建设和维持。

提供高质量综合性初级卫生保健服务

1. 倡导健康

关注用水卫生、食品安全、环境危害、群体生活方式以及影响人们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社会环境问题。普及卫生知识，关注生理、心理等全方位健康。

2. 预防疾病

生病后的即时治疗当然重要，但不能局限于治疗而忽视预防。对服务区人民进行有效的健康检查，及时发现异常指标，提供全民以及特定人群如儿童的各类疾病疫苗。

3. 首诊服务

初级卫生保健提供首诊服务，改变以往医院和专科医生首诊的现象，建立服务区所有个人卫生档案，不同地区/机构可以共享，提高医疗安全性和成本效益。同时也有利于基于证据的科学研究和国家卫生政策的制定。

4. 持续治疗

出院病人常常需要康复治疗，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治疗。这些服务由个人(家庭)保健医生提供不仅方便了病人和家属，也最大程度保证了治疗的连续性。还可使许多以往的住院治疗转变为居家治疗，大大降低医疗费用，提高成本效益。

5. 电子医务

信息和通讯技术在初级保健的应用可以大大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电子病历可以改善卫生信息共享，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降低医生失误率与个人的医药费用，远程诊断、检测和咨询技术也可帮助边远地区获得专家支持。

建设高水平初级卫生保健专业人士团队

初级卫生保健主要由全科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提供。建设一支受过高质量教育和职业培训，专业互补，团结合作的多学科专业人士团队至关重要。同时，全国各地社区医疗服务中心也比纯粹的“大学生下乡当村官”等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大学生就业与农村人才缺乏的问题。

结语

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建设的初级保健模式，不同于以往简单、分散、用低技术或非专业处理一些疾病的卫生站，这是一个能使用高技术、为所有人(家庭)提供高质量综合性服务的现代初级保健体系。这种初级保健可以使政府和个人的资金效益最大化，提升卫生系统的效率和绩效。